

山西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摔跤挠羊赛与近现代忻州、定襄、原平社会

姓名：潘慧生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中国近现代史

指导教师：王守恩

20060601

摘 要

摔跤挠羊赛是山西忻州市、定襄县、原平市独具特色的民间体育活动，它经受了社会的动荡和历史的考验，代代相传下来。笔者经过长期的田野考察和查阅有关文献发现，摔跤挠羊赛是战乱和民族融合等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经济的发展是其得以传承的物质基础，明清庙会的兴盛是其传承的载体。摔跤挠羊赛的组织者伴随着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变迁，由社区自治组织转变成了基层政权。村落凝聚力的强弱是摔跤挠羊赛能否成功主办的关键，而良好的跤场秩序和公平的比赛又可以增强本村村民的凝聚力和村落的影响力。传统乡村社会的教化体系制约着赛场跤手和观众的行为，使挠羊赛能够有序进行，而挠羊赛本身也是一种面向大众生动的教化活动。民众的广泛参与是摔跤挠羊赛的生命源泉。成套的有关摔跤的词汇，广泛渗入了乡土话语。由于特定的文化背景，文武并重成为近现代忻、定、原社会的一种价值观念。

关键词 摔跤；挠羊赛； 挠羊汉；忻州、定襄、原平社会

ABSTRACT

The Sheep-winning Wrestling Championship is a rural sports event in Xinzhou, Dingxiang and Yuanping of Shanxi Province, which, undergoing social turbulences and historical tests, has been passed down through the generations. The present author, having conducted long field research and consulted relevant literature, finds that it is a product of many elements such as wars and ethnic integration, which is, in a material sense, based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arried on by the popularity of temple fairs. The hosting party, with the evolution of power in rural society, has transformed into the local official governing body. The good agglomeration of the villages is the key for the successful hosting of the championship while good order and fair competition increase agglomeration and promote influential power of the villages. Traditional ideas of moralization in rural societies restrain the behavior of the wrestlers and the audience so the competition can run in an orderly way while reversely the event becomes a vivid activity for the moralization education of the rural people. Wide-spread participation provides liveliness and vitality of the event. A set of vocabulary becomes a part of the rural dialects. Due to the special cultural background, the idea of stressing both civilization and physical force is accepted as an important value in Xinzhou, Dingxiang and Yuanping in the contemporary and modern times.

KEY WORDS: wrestling; sheep-winning championship; wrestler; Xinzhou, Dingxiang and Yuanping societies

引 言

摔跤挠羊赛是以一只羊为奖品的独具特色的民间体育活动，它盛行于山西北中部素称“摔跤之乡”的忻州、定襄、原平等县市。摔跤在当地民间叫“跌跤”或“跌对”，日常生活中人们的嬉闹玩耍之摔叫“瞎跌”，有组织的以羊为奖品比赛称为“挠羊赛”。“挠”意为“扛”，“挠了羊”就是获得摔跤冠军者把羊扛走。该活动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如潮如波地涌动千年而经久不衰。它产生于农牧两种文化的碰撞、交融，历经千年，到清末和民国初年出现兴盛和辉煌。它深深地植根于忻州人的生活之中，在外敌入侵和国内战乱时期出现短暂的萧条后，1949年以来再次焕发出青春。它的起源是该地区的自然环境、社会变迁、经济发展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它的发展与演变又对该地区的人际交往、价值取向以至乡村社会秩序等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关于民间体育活动与社会互动的研究已进入学界的视野，但从目前研究成果看多为探讨其历史来源和本身所具有的娱乐功能或就体育论体育。对摔跤挠羊赛这一特定区域的民间体育娱乐活动，目前学界还无人进行全方位的专题研究，只有忻州地方文化人士做了一些资料征集和初步探讨的工作。主要成果有雷鸣主编的《忻州摔跤文史资料汇编》，张金锁编著的《原平跤坛风云人物》；另外廉考文、李有成、孙崇文、关彬、张明远等人先后在《忻州文史资料》、《忻州大观》、《忻州魂》、《忻州史话》上撰文，就摔跤挠羊赛的起源作了一些有益的考察。

本选题是以摔跤挠羊赛为研究对象，依靠田野考察和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力求探讨摔跤挠羊赛与近现代忻、定、原区域社会的互动关系，主要是区域社会的历史变迁、经济发展对摔跤挠羊赛生成与发展的作用，摔跤挠羊赛对在当地乡村社会秩序的维持、乡村社会生活的特色和价值观念的形成等方面的影响。笔者希望这一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忻、定、原区域社会。

第一章 摔跤挠羊赛的社会历史背景

摔羊赛是我国传统摔跤运动的一个重要分支，是我国古老的“角觝”和“角力”的承袭和发展。近几年来忻州的一些地方文化人士对摔跤挠羊赛的起源等问题有过一些探讨。他们依据民间传说和史料中的只言片语，提出忻州摔跤起源于唐代末年或北宋、金代等观点。^①但他们在论证中都存在一个重要的不足，就是没有注意到传统摔跤

^① 忻州地方文化人士，如孙崇文、李有成等先后在《忻州魂》、《忻州大观·忻州民俗专刊》上撰文，认为忻州摔跤挠羊赛起源于宋代或唐代末期。

运动与当地摔跤挠羊赛之间在起源上的区分。

在这里我首先依据历史文献和田野考察到的材料,对忻、定、原摔跤运动的起源、传承和挠羊赛这一有组织的比赛形式的出现试作探讨。

1 摔跤运动的历史渊源

摔跤在古代称“角觥”、“角力”。根据文献记载和传说,这种运动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南朝梁时任昉的《述异记》又载:“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黄帝)斗,以角觥人,人莫能御。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戴牛角而相觥,汉造角觥戏,盖其遗制也”。西周初年,摔跤作为练兵的科目出现在军队中。《礼记·月令》载:“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驾馭、角力。”战国时期,由于战争频繁,作为军事训练科目的摔跤开展得更加广泛,《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记载晋楚城濮之战前夕,“晋侯梦与楚子搏”。秦统一六国后,将角力统一易名为“角觥”,继续作为军事训练的科目,蚩尤戏开始出现在节庆活动和宫廷之中。《史记·李斯列传》载“是时,二世在甘泉,方作觥觥优俳之观”。

汉代史学家班固撰写的《汉书》称:武帝在摔跤的基础上“并四夷之乐,杂以童幼、有差鬼神”。这种有音乐伴奏、有故事情节的武打,称为“角抵戏”。另有《汉书·金日磾传》载:金日磾原为匈奴休屠王的太子,在一次战争中为汉军所俘,后入宫饲马。由于他为人忠诚、做事勤恳,被汉武帝提拔为侍卫。有一天夜里,武将江充与莽何罗携带武器入寝宫刺杀汉武帝,被金日磾发觉。“日磾摔胡投何罗于殿下,得擒缚之”。“摔胡”就是抓住脖子把对手摔倒在地,这是一个纯粹的摔跤动作。这说明汉代的摔跤有很大的发展。

南北朝时期,“摔跤”是最受欢迎的比赛项目,称之为相扑、相辟、相攢,都是互相摔打的意思。据《太平御览》引王隐《晋书》说:在中原地区的襄城、颍川两郡就有相扑比赛。襄城人在赛输之后自我解嘲地说:“相扑下肢,不足以定两郡之优劣!”。

唐代的皇帝大都喜爱体育活动,他们喜欢打马球、射箭、狩猎和角觥。《新唐书》称:“角觥者,相扑之异名也。”“宫廷内苑恒备角觥之徒”。《文献通考》上说:作为宫廷的娱乐活动,角觥是各种表演节目的压轴戏。摔跤手临上场前,左右军就擂起大鼓,一个个赤裸上身的壮士随鼓声绕场而入,寻对扭摔。双方一交上手,观众就呐喊助威,分出胜负之后,观众欢呼,急鼓三通。《太平御览·吴兴杂录》记载:“唐,中元节,俗好角力相扑,云避瘴气也。”避瘴气是一种习俗活动,实际也是农闲时的娱乐。近来考古学者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唐代幡画,画面上为两人决斗,很像现代日本的相扑。

宋代史书称摔跤为“相扑”，也有称“角觝”，它是宫廷宴会娱乐的压轴节目。《宋史·乐志》记载：“宴会……节目为角觝，赛罢宴毕”。《东京梦华录》记载：“天宁节，设御宴……左右军相扑，宴退，臣僚皆簪花归私第。”除了皇宫中宴会有相扑表演外，外交宴会也有相扑比赛。《宋史·礼志》记载：使者到阙延宴，“凡用乐人 300 百……相扑 15 人。”

北宋首都开封有供市民娱乐的场所，名叫“瓦子”。在瓦子里最受欢迎的比赛项目就是相扑。据《都城纪胜》、《梦粱录》、《武林旧事》等书记载，仅南宋临安城就有著名的相扑艺人 50~60 人之多，其中如：撞山倒、周黑大、曹铁拳、王急快、韩铁柱等，都是南宋京城的摔跤好手。宋代已经有了全国性的相扑比赛，并建立了比赛规则，这种规则称为“社条”，称裁判为“部署”。山东泰山庙会的相扑比赛是全国规模最大的赛会。北宋末年的《忠义水浒传》中有一幅摔跤插图，图的左上方有一官吏端坐，旁立侍从，摔跤台下栏杆周围站立着许多围观者，图中一个摔跤手把另一名摔跤手高高举过头顶，即将摔倒，观众鼓掌欢呼，这和《水浒全传》第 74 回写燕青和任原比赛的情景相吻合。书中写道：“任原见燕青不动手，看看逼过右边来，燕青只瞅他下三面。任原暗忖道：‘这人必来算我下三面，我不消动手，只一脚踢这厮下台去。’燕青闪电般抢将入去，用右手扭住任原，探左手插入任原交裆，用肩胛顶住他胸脯，把任原托将起来，头重脚轻，借力便旋 4、5 转，旋到戏台边，叫一声：‘下去’，把任原头在下、脚在上，直撞下戏台来。这一扑名唤‘鹁鸽旋’是以小打大，而‘虎抱头’是以强打弱。”这说明宋代的相扑已发展到以巧取胜！

到元明清朝，摔跤进入鼎盛时期。后来，除一些少数民族外，它大部分地区已经衰落。惟独位于山西北中部的忻州、定襄、原平等县市的摔跤挠羊赛依然生命力旺盛。

2 摔跤挠羊赛与战乱环境

关于挠羊赛的起源在该地区有众多的民间传说，这里依据有关资料复述如下：

其一，北宋初年，长城一带常常烽火迭起、报警频仍，不得不任用老于边事的杨业为代州刺史，抵抗辽人。然而，宋太宗又害怕难以驾驭，便让潘美秘密监督。面对强大骁勇的辽军，杨业兵少将寡，又受潘美的牵制，心理非常焦急。夫人余太君认为将来自兵、兵来自民，建议把乡间青壮年组织起来，平时习武、战时对敌。为了避免潘美向朝廷诬陷犯上作乱，采取民间娱乐形式，让民众自行组织。余太君把杨家拳进行改编，演化出一种既不伤人、又能习武健身的招式，即摔跤，让杨七郎组织各村寨的小伙子演习。正月十五元宵节，杨业以地方长官的名义，相机引导，与民同乐。潘

美闻讯，也匆匆赶来。杨七郎把各村寨分成两个阵营，年轻人轮番进行竞技抗争，胜者当场发给礼物。由于杨七郎是有名的淘气鬼，潘美认为这是娃娃们的玩艺，不仅没有干涉，还夸奖了七郎几句。之后各村寨就在传统庙会上举行这种比赛，年轻人一有空，便进行练习。杨业遇害后当地人民为了纪念他，便将这种活动传承下来，就是民间盛行的挠羊赛。

其二，南宋抗金英雄岳飞为了增强军队战斗力，在军中开展了相扑训练。其部下有一位老兵叫陈效婴，祖籍忻州，相扑技艺很高。岳飞蒙冤后，回到家乡继续从事抗金斗争，并把自己的相扑技艺传授给家乡的年轻人，就形成了后来的挠羊赛。

这两则传说，前者流行于原平，后者流行于忻州。传说虽不能当作史实，但往往可以起到佐证历史的作用。从以上传说不难看出，有两个共同点很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将忻州摔跤的源头追溯到宋代“一门忠烈”的杨家将或“精忠报国”的岳家军，这与宋代摔跤活动在民间普及的历史相一致；二是都把忻州摔跤与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

清光绪版《忻州志·形胜》指出：“三晋为神京右臂，忻郡又为省会藩屏，南接太原，北通沙漠，左出右入实省北一大都会。”“忻郡为全晋后藩，三关内障，出入锁钥，诚属要地。”“忻境近边，当晋北孔道，……自汉迄明，争战不息”。忻州地处晋北要冲，史称“三关总要”，是古代长城一线外三关（即偏头、雁门、宁武）的重要后方基地。坐镇忻州，既可指挥三关，又可补给三关。在这块土地上，历代大大小小的战争多如牛毛。这里是汉代阻止匈奴南侵、唐代打击突厥骚扰、宋代抵抗北辽进攻、明代防止蒙古贵族复辟的前沿阵地。为进一步说明问题，随录几条资料如下：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赵国名将李牧镇守雁门与匈奴对峙，“率兵左右夹击，打破匈奴十万骑，单于败北而逃”。后人在雁门关建靖边寺一座，现存汉白玉碑一座。

据《汉书》记载，西汉文帝元后六年（公元前158年），匈奴大举南侵，闯过雁门关，占领忻、定、原。整个汉代雁门关始终是阻止匈奴南下的战略要地。

《北史·突厥传》载：公元557年，宇文觉夺取西魏皇位，建立北周。北周保定三年（563年），杨忠“兵出武川（今内蒙武川）南下伐齐，……齐人死守陁岭（雁门）之隘，杨忠纵骑兵奋击，大破之，至晋阳而还。”

《隋书》载：大业二年汉王谅起兵并州讨伐杨广，派遣大将乔钟葵率劲卒三万围攻代州，朔州刺史杨义臣奉诏援救，夜出雁门，与代州守军合力击败钟葵。

《唐书》载：唐武德二年，刘武周引突厥军入句注，寇太原。五年，突厥颉利入

雁门，寇并州。永隆二年，礼部尚书裴行俭任定襄道行军大总管，于代州之西陉口（今代县白草口一带）伏击突厥余众。会昌二年，回鹘犯塞，诏河东节度使屯雁门关。广明初年，沙陀入雁门，寇忻代、逼晋阳、陷太谷。

到北宋年间，杨家父子先后坐镇长城的雁门关等各口抵御辽军进攻，战功显赫，威震关外。

1214年，蒙古军直捣忻州，他们破城垣、毁灭民居、屠戮百姓，历史上称作“蒙古屠城”。对于此次事件史料记述颇多，如元好问的《续夷坚志》等。

明洪武元年（1368年）明将徐达和常遇春进军山西，常遇春追杀元军到忻州时，人民死伤无数，几乎十室九空，所以当地至今广泛流传着“常遇春剿杀秀容县，吃语酿祸方醒令归”的传说。^①

上面虽不惜笔墨列举了一些历史上发生在这一地区的战争，但比起忻、定、原所经历的全部战争，所列资料不过是九牛一毛，即便是白纸黑字的史志也只是一个“大概”的统计。整个中华民族的王朝演变史，几乎是一部中原汉族和北方民族的疆土争夺史，而忻、定、原又正好处于他们的夹缝之中，必然成为双方的必争之地、征战地区。至今依然可见一处处墩墩（烽火台）和以堡、寨、营、镇命名的村庄，仅忻州境内当年便有60堡、18寨、26墩。残酷的战争生活，决定着强者生弱者亡，为了生存就必须有健壮的身体和御敌自卫的本领。翻阅三县县志，都有“民风尚武”的字眼，可这并非是这里的人喜欢打斗，而是在频繁战争和社会动荡的环境下人们作出的无奈选择。忻州最南端的石岭关，自古以来就是“晋北锁钥”的标示性实体，关下的关城村是闻名遐迩的武术村，因而当地便有“麻会（忻州一村名）的老汉说不得话（善论辩），关城的老汉打不得架（善武术）”的谚语。像关城村这样的村庄很多，如定襄县的河边、原平市的东社、西关、北关、赵村、麻河沟、镇安寨等，武术活动都非常普及。当然要放到全国或全省的“天平”上衡量，忻、定、原的武术并不十分突出，但武术与摔跤相比，特别是与拳术相比有许多相似之处。摔跤，实际是集中国武术中的踢、摔、拿等各种技法的精华于一身、并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独特的技术体系、在历史上被当作健身与习武相结合的形式而发展的。

忻、定、原地处“晋北孔道”、“三关总要”的位置，但其距雁门关所在的长城前线，中间却有代县相隔，它实际是前线上的后方，虽也不断遭到战争的涂炭，可是与

^① 忻州民间广为流传：当年常遇春因贫穷流浪到秀容县（今忻州）时，秀容人倍加歧视，使其怀恨在心，发誓有朝一日定报此仇。元末农民战争爆发后，他成为朱元璋麾下的一员大将。有一年率部追击元军，到达忻州，夜间做梦发令“剿杀秀容”。醒来急令收兵时，军队已杀到县城东几十里之外。现在忻州有一村叫“令归”，就是传说中常遇春急令军队撤回之地。

雁门关脚下的代县相比，毕竟要相对安定一些。这样代县人为自卫而习武就要比其他地方更为紧迫一些，逐步形成了“螳螂门”和“弓刀门”两个独具特色的武术门派，而忻、定、原的人们则选择了集健身、娱乐、习武为一身的摔跤，并相沿成习，代代相传。

3 摔跤挠羊赛与民族融合

粗略计算，从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到 1911 年，忻州地区受北方民族所建立的政权统治长达七百年之久。

忻、定、原在地域上相互毗邻，东面是五台山，西面是管涔山，北面是长城，南面是系舟山，周围高山环抱，内部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对外交往相对不便，呈现出很大的封闭性。远古时候，境内气候比现代温暖潮湿，古木参天、地肥水美。根据考古发掘，早在 30 万年前此处就有原始人群生活，在距今 5 千年的龙山文化时期，由于滹沱河流域气候湿润、黄土肥厚，得到广泛的开发，农业文明在本地区开始了第一个鼎盛时期。到商代中晚期，由于晋陕一带游牧部族的崛起，滹沱河流域成了他们狩猎和游牧的场所，农业减少，大片土地荒芜。西周至春秋前期，一部分部族定居在这里，他们除经营牧业外，开始垦荒种植，使这块土地再次焕发生机。^①此后，以农为主、兼营牧业就成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基本生产生存方式。

到秦代以后，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该地区成为北方游牧民族与当地耕民相互碰撞与融合的前沿地带。激烈的军事冲突并没有成为农牧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障碍，实际上历史上中原汉族和北方民族的疆土争夺史，又是一部黄河文明与草原文明、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流史、融合史。秦汉时期的匈奴民族文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鲜卑文化，隋唐时期的突厥文化，宋、辽、金时期的契丹、女真文化，元代前后的蒙古民族文化，明清时期的满族文化都不可避免地在这块土地上留下痕迹。匈奴、鲜卑、羯、氐、羌、突厥、契丹、女真等游牧民族在不同时期不断内迁，与当地原有居民混居。他们在接受当地汉族文化的基础上，也使当地居民部分地接受了他们原有的风俗习惯。就山西全省而言，隋唐以前的民族融合几乎是在全省范围内展开，五代至宋金内迁山西的各民族主要集中在太原以北地区。魏晋南北朝民族融合的成果，为隋唐盛世的到来准备了条件。隋唐盛世不仅巩固了前期民族融合的成果，并使不同地区在前期民族融合中形成的新的生活习俗得以进一步加强，初步形成了区域之间有一定差异

^① 参阅 忻州行署教育局编《山西省中学乡土教材·历史·忻州册》，新华出版社 1992 版。忻州考古队编著《忻州游邀考古》，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的民俗文化圈。

文化圈是一个有机体的文化整体,它包括人类需求的各种文化范畴。“民俗文化圈,是一种以族群为活动依托,具有地域性和传承文化特征的民俗文化生存形态。”^①它“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是本文化圈中的每个个体对传统文化实践的总合,它不是一夕一蹴而就的。一个民俗文化圈一旦形成并定型,便显示出区别于其它文化圈的文化个性或文化风格,并且形成比较稳定的特性。”^②“每一个民俗文化圈是该文化圈中每个个体内化了的习俗构成的外在文化体系,这个文化体系是在不断的文化整合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文化体系一经形成,便对该文化圈中的每一个成员产生影响,并形成一定的文化类型或人格类型。”^③中国传统社会秩序是建立于农耕经济基础之上的,土地是人们最重要的生活资源,由于土地无法流动,使人们世代被束缚在土地上,形成了一个“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④再加上政治、军事、自然环境、民族融合等原因就出现了以区域划分为标志的具有相同生活习俗的民俗文化圈。

五代至宋金,地处山西北中部、长城以南战略要地上的忻、定、原地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成为山西民族融合的中心。这里的人们在吸收契丹、女真二族生活习俗的基础上,具有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圈初步定型。元明清三代是前一段民族融合的巩固时期,也是蒙古族和满族文化注入时期。征服者以其独特的方式散居在各个军政要地,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步与当地居民融合在一起。

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人们的交流的工具——语言,也必然伴随民族融合而发展变化。人们不断对融入本地区的各民族语言加以改造和吸收,以适应新的生活习俗的传承。由于生活习俗上的区域差异,其传承工具的语言必然也会有差异,这样就自然形成了代表不同习俗文化的方言圈(这里指在方言基础上进行分片后的地方语支)。忻、定、原方言同属晋语五台片,根据前文所述民族融合的历程,可以推断该方言圈在金元时期形成,明清时期定型。方言圈的定型、传统农耕经济的生产方式、区域的相对封闭,使该区域内人们在民族融合过程中形成的生活习俗逐步固定化和程式化。这样生活在忻、定、原地区的人们,由于具有相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便形成了具有相同生活习俗的文化圈。

在这一文化圈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事象就是摔跤挠羊赛,它实际是中国古代传统“角觝”与北方游牧民族“摔跤”相互融合的结果。在我国北方辽阔的草原地带,摔

^① 陈文华:《论民俗文化圈》,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第41页。

^② 马成俊:《论民俗文化圈及其本位偏见》,青海民族研究(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8期,第93页。

^③ 马成俊:《论民俗文化圈及其本位偏见》,青海民族研究(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8期,第93页。

^④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72页。

跤自古以来就是游牧民族最为喜爱的体育运动。考古发现最早的角觥图象资料,是“在陕西省长安客省庄 K140 号战国晚期墓葬中出土的角抵铜饰牌。铜牌表现的是在森林中举行的摔跤比赛,……这种风格的饰牌一般被认为是游牧民族的青铜艺术品,属于与匈奴等古代游牧民族有关的文物,……这种风格的铜饰牌在北方草原有许多出土地点不明的传世品。”^①魏晋时期,北方草原的摔跤运动盛行,是和赛马并列的两大体育运动。据《大藏经·续高僧传·魏洛京永宁寺天竺僧勒那漫提传》载:“时洛南玄武馆有一蠕蠕客,曾与提西域旧交,乘马皮衣,时时来造相寺,二人得,言笑抵掌。文傍见,夷言不晓往复,乃谓提曰:‘……此北犹耳!兽心人面,杀生血食,何足可尚?不期对面,遂成如此。’提曰‘尔勿轻他!’怀文曰:‘此所知当与角觥、赌马’。”蠕蠕属于鲜卑族系,可知摔跤和赛马一样在北方游牧民族中广泛流行。

作为鲜卑族后裔的契丹人,承袭匈奴和蠕蠕的北派摔跤,并且有所发展,辽代文献和考古资料都有翔实而形象的记录。北宋使臣张舜民在他出使契丹后撰写的《画漫录》中记载:“北虏待南使,乐列三百余人,舞者更无回旋,止于顿挫缩手足而已。角抵以倒地负,两人相持终日,欲倒而不可得,又物如小额通蔽其乳,脱若露之,则两手负面而走,深以为耻也。”1931年,在辽阳市辽东京故址附近出土了一件八棱形辽代白色陶罐,在罐的八个面上分别绘出契丹儿童角抵的比赛场面,形象地印证了文献记载的可靠性。^②元朝王室起于北方的蒙古族,在辽阔草原上以游牧为主,习俗重骑马、射箭和摔跤,称为“男子三项竞技”。据《蒙古秘史》载:元太祖成吉思汗于1218年远征前,商议将汗位委托给皇子,于是拙赤和察哈台二子争夺汗位。“拙赤起揪察哈台衣领曰:……若远射败于汝,则敢断其拇指而弃之。若相搏败于汝,则自倒地勿起之,愿听父汗圣旨裁夺”。^③这说明蒙古族在继承王位上,射箭和摔跤是重要的条件。在《元史》中经常有“赐民间角觥者钞各千贯或银千两”的记载。

既然自古以来摔跤就是游牧民族最为喜爱的体育运动,占据忻、定、原地区的游牧民族也必然开展摔跤活动。当地民众在长期战争生活中为了生存而形成的尚武精神和传统的角觥就很自然地与游牧民族带来的摔跤运动相互结合,并逐步形成了“挠羊赛”这一独有的民风民俗。

在忻、定、原有这样一个传说:很久以前,忻定盆地有一大湖,湖周水草茂盛,

^① 张松柏:《辽代的摔跤运动》 内蒙古文物考古 1997年第1期,第29-30页。

^② 鸟居龙藏:《契丹之角抵》,《燕京学报》第29期。转引自张松柏:《辽代的摔跤运动》 内蒙古文物考古 1997年第1期,第30页。

^③ 转引自李国安:《我国古代摔跤运动发展史略》,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04年第5期,第37页。

人们以放牧为生，休息时即以羊作赌注进行摔跤比赛。不难看出，这个传说与史料记述和考古发掘一致。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在忻、定、原这片土地上出现摔跤，与中国古代摔跤运动同步而生。也就是说，人们由于生活在相同的自然环境下，具有相同的生产生存方式，出于本能和娱乐的需要，摔跤已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宋金元时期，随着民族融合的加深，当地人把契丹、女真、蒙古族摔跤比赛的内容加以改造后吸收。尤其是在元代蒙古族人占统治地位后，大规模战争基本结束，国内出现了安定的局面，蒙古族的摔跤运动，逐渐变得娱乐成分愈来愈浓。元武宗时，曾授角抵选手马可谋沙为“平章政事”之职。仁宗时，朝廷还专门设立了管理摔跤运动的“校署”。《口北三厅志·诈马行》中描述，“九州水陆千官供，曼延角觝呈巧雄”。这说明元代的宴会娱乐中，以摔跤为重要项目。虽未在文献资料中找到关于忻、定、原“挠羊赛”吸收契丹、女真、蒙古族摔跤比赛的内容，但我们知道金元时期是北方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融合，而特定的历史环境又使在长城以南战略要地上的忻、定、原地区成为山西民族融合的中心，在吸收其他生活习俗的同时，摔跤比赛也必然会得到吸纳与创新。

4 摔跤挠羊赛与经济发展

一场摔跤比赛能否举行并能最大限度地满足跤手和跤迷的需求，首先必须以一定的经费作保证。除给予组织者、喝跤人（裁判）、赛场秩序维持者一定报酬外，大宗费用是买挠羊汉的奖品（一般为大绵羊）和参赛跤手的礼品。而传统挠羊赛是在古庙会期间每天晚上戏曲演出结束后举行，一般是四天唱七场戏，也就是说最少也要举行四场赛事，这确实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样对于举办村庄来说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是很难办到的。

忻、定、原是一个对外相对封闭小区域，境内地势平坦，很早以前农牧业就比较发达。明清时期，随着晋商的崛起，南来北往的物资流通，使忻州人大开眼界。他们背井离乡，追随晋中商人，进入远征的商业大军之中。部分人的成功，必然促使同乡人顿起艳羡。经商的持续兴旺，又使当地百姓观念上发生根本的转变，抛弃那种“走一处不如守一处”、“好出门不如歹在家”的保守思想，很多人走上从商道路。当地俗语“有奈无奈，赤脚板子走到口外”、“东口到西口，喇嘛庙到包头，西安库伦京津沪，走变天下不发愁”，就是当年忻人从商的真实反映。光绪五年忻州知州方成昌说过：“忻郡为晋阳北路门户，地近边塞。我朝定鼎以来，蒙古慑服，中外一家，二百余年，从未用兵。忻郡之民如出水火而登衽席，休养生息，户口繁孳。乾嘉之间，习于边情者

贸易蒙古各部及西北口外各域，有无相通，权其子母，获利倍蓰，忻人不但不受近边之害，转受近边之利，以此致富起家者实多。”^① 据 1935 年版《山西大观》统计，全县 20 万人口，从商者即达 38918 人（其中男 38503 人，女 415 人）。^② 位居全省前列。这就为乡村公共事业，如水利建设、修桥铺路、迎神赛会、文化娱乐等提供了经济基础。

挠羊赛作为忻、定、原农村的一项重要村民娱乐活动，其经费来源与庙会一样，主要有三部分组成，即村民摊派、富户捐助和庙会期间向商贩收取费用（农业集体化期间，其费用由集体承担）。村民的富裕程度和庙会期间商业往来的多寡是庙会和挠羊赛成功举行的关键。明清时期该地区商业的发展在农村造就了一大批富裕的人群，他们往往在举行庙会和挠羊赛时出资捐助，使庙会商贾云集，摊贩遍地。如一九二四到一九三七年期间，每年农历三月十五至二十四在忻州奇村龙泉山举行的游艺、骡马大会，“修庙、赶会等经费来源，主要依靠募捐，其次是骡马会上的收入”^③。作于乾隆三十七年的《重修岱岳殿碑记》载“每岁三月念七日，远迩士民酬愿进香者甚众，而逐利之夫，贸迁于是，无虑千人。”^④

忻州城北 15 公里处的永丰庄（原名辛庄，1982 年改名），今天是相对封闭和落后的，不为世人所重视。但它在清代到民国初年却是相对富裕的，尤以跤场之盛而闻名，号称忻州最大的跤场^⑤。该村每年农历七月二十七举办龙王庙会，二州五县（二州指忻州、代州，五县是定襄、五台、繁峙、原平、静乐）的跤手云集、切磋技艺，四邻八乡的跤迷齐聚跤场，达五千人之众，而该村在建国前总人口不足千人。笔者曾对该村进行过较为全面的考察，可知该村在历史上有两大优势，其一是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曾是人们南下太原，北上塞北的交通必经之地，商贾往来频繁，村民视野开阔。许多村人北上丰镇、包头、呼和浩特从事商业活动，富户很多。据传始建于清代初年的龙王庙，就是当时村中经商致富的大户王家出资所建。到清代中叶张家、潘家陆续崛起，他们不仅起院建屋，而且不断出资捐助兴建公共设施、举行庙会和挠羊赛等。其二是该村所处地段与周边地区相比较低，盐碱肆虐，土地贫瘠，村民自古以来就以熬制食盐为生，素称“熬盐辛庄”。该村食盐销遍二州五县，使广大村民的经济收入明显增加。当然该村能成为忻州最大的跤场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其所具有的这两大优势应是必不

^① 转引自张明远著：《忻州史话》，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第 307 页。

^② 转引自于颖：《解放前的忻州商业》，忻州文史资料，第 7 辑，第 56 页。

^③ 王极民：《龙泉山庙兴废概述》，忻州文史资料，第 1 辑，第 90 页。

^④ 马腾蛟：《重修岱岳殿碑记》，忻州文史资料，第 8 辑，第 62 页。

^⑤ 《忻县志·体育卫生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 年版。

可少的因素。

5 摔跤挠羊赛与庙会

庙会是在特定日期在寺庙及其附近举办的集宗教祭祀、文艺游戏、商品交易为一体的民间集会，一般与宗教节日和当地民俗相连。从它产生之日起，就与文化艺术密切相连，渐次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庙会文化。庙会文化作为庙会的组成部分，以寺庙为最初依托，以宗教活动为最初动因，以集市活动为表现形式，并随庙会的发展而延续、传承。民间古庙会最早起源于原始社会中期对鬼神崇拜的祭祀活动，奴隶制时期是庙会文化初步形成时期，封建时代是庙会文化的鼎盛时期。唐代宗教世俗化的发展推动了庙会文化的发展。宋金元时期，随着北方游牧民族的侵入，使内地生产力遭到破坏，北方庙会走向衰落，直到元代末年才有所改变。明清时期，社会稳定、商业繁荣，华北的冀鲁豫集镇经济呈现繁荣的景象。山西由于农业生产水平低下、生产消费的季节性特点、闭塞的环境、丁戊奇荒的打击，阻碍了市镇经济的发展。但庙会以其规模大、分布广、季节性强等特点与山西特定的自然环境和农民的生活、生产节奏相吻合，对集市产生了独特的替代作用，获得了迅速发展。^①

庙会从其产生之日起，虽各有主题，但文化与经济是贯穿始终的主线，形成了它的文化经济特色。“庙会与民俗、地域文化和民族经济结合形成庙会民族文化经济特色。”“民族文化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一脉相承的文化心理、思维定势和价值取向等的集中反映，具有特定的社会功用和实用价值，它与基本的经济生活的结合，使庙会文化成为直接来自民众，更贴近民众的大众化、民众化的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更具顽强的生命力和持久力。”^②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可以推断，山西在经历了金元时期新一轮的民族融合后，各地形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艺术和文化习俗必然会在明清时期表现出来，并成为庙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明清时期山西庙会的迅速发展成为民俗文化和发展的载体。在地处山西北中部的忻、定、原地区，民间摔跤比赛在历经金元民族融合，充分吸收契丹、女真、蒙古摔跤比赛的内容后形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摔跤挠羊赛很自然地成为当地庙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挠羊赛是忻、定、原民间的一项规模性群众竞技活动，与这一区域各种古庙会相伴而行。有古庙会就有挠羊赛，不举办古庙会而单独举办挠羊赛的情况也有，但极为罕见。“自古民间多庙会，庙会场上必摔跤”是该地区的真实写照。当地俗语有“唱戏

^① 参见行龙、张万寿：《近代山西集市数量、分布及其变迁》，《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

^② 秦永红：《庙会的文化经济特色及其历史、现状与未来的展望》，《宗教学研究》，1995年第4期，第66页。

不摔跤，瞧的人就少；唱戏又摔跤，十里八村都来瞧”。庙会是人们表达对神灵的信奉、供奉的最集中、最典型的形式。但从实际情况看，对于普通百姓来说，除求得神灵保佑，以达到消灾免祸、发财致富外，更主要、更实在的意义还在于娱乐，既娱神又娱人，而神是虚幻的，人是实在的。从以上俗语我们也可以看出，当地人们在心理上和实际行动上是把举行庙会作为消遣和放松的机会。而将展示生命辉煌、寻求获胜快感的摔跤挠羊赛纳入古庙会，则是锦上添花、珠联璧合，它成为古庙会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内容。

庙会以寺庙为最初的依托，即没有寺庙依托前是不可能有的。根据笔者走访情况可知，在历史上忻、定、原地区几乎每个村庄都有庙宇，虽然由于战争和文革的毁坏已无法考究共有多少寺庙、它们始建于何年，但从1984年忻州文化部门对城区和乡村文物普查资料可知，古寺庙和古戏台现存143座，其中明代建造的有23座，宋代1座，其余均为清代建筑^①。就忻州而言，庙会究竟始于何时，一年举行多少次，尽管已无从考究，但在“清代仅县城从农历正月到九月就举办各种庙会二十七次”^②，同时各村镇几乎每年都要举行一次庙会。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明清时代，忻、定、原与山西其他地区一样，庙会进入兴盛阶段。这样，挠羊赛作为当地庙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随着庙会的兴盛得以传承和长足的发展。

第二章 摔跤挠羊赛与乡村社会的秩序及关系

摔跤挠羊赛得以传承与发展的另一个原因是其组织形式能够适应乡村社会秩序的变迁，它是乡村社会秩序的一个外化的表现形式。它以乡村为依托，受乡村社会生活秩序嬗变的影响，同时又反作用于乡村社会。

1 摔跤挠羊赛的组织与乡村社会权力体系的变迁

在传统中国的统治秩序中，封建皇权往往只延伸到县一级，而对于县以下的乡村社会，则缺乏足够的控制能力。对乡村社会控制的主导力量是士绅，他们在乡村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们是功名获得者、乡居退职官员或是一个家族的长老和村中比较有威望的人。这些人凭借他们的权威，用一定的乡土文化，管理着较为封闭的乡村，充当着地方和政府之间的桥梁，一方面稳定乡村秩序，另一方面使政府的一些任务如征收赋税等得以完成。

^① 参见《忻州文物一览》，忻州文史资料，第11辑，第114—140页。

^② 于颖、李文华：《忻州庙会今昔》，忻州文史资料，第3辑，第158页。

民国初年国家权力开始向乡村渗透，山西阎锡山对传统的乡村制度进行变革，1917年9月颁布《县属村制通行简章》，推行村制建设，20年代末基本完成，首次将村列为国家的基层行政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把乡村社会的整合放在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直至人民公社化，有力地冲击了农村社会传统的权力体系和控制方式，国家与社会高度一体化。文革时期民间固有的信仰、观念、仪式和习俗，被视为愚昧落后的东西遭到批判和禁止。1980年以后，以经济体制变革为先导，国家行政权力逐步从乡村社会中收缩，过去一直作为国家压制、打击、禁止和消灭的东西不同程度地得到恢复。

忻、定、原地区传统摔跤绕羊赛的组织，在国家权力向乡村渗透前，完全由村民自发地进行。村社是它的最高组织单位，士绅在其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一般情况由村长授权庙会自主操作，或由村中有权威的族长、长者、村民心目中的能人等组织，这些人实际就是地方精英。组办村被称为“社家”，组办者被称为“社首”。所谓社，就是中国古代的聚落或土地之神，以后又延伸发展成为乡村的基层社区组织，同时，又演化成为按职业、爱好、阶层、以及特殊目的等结成的群体。这里的“社家”、“社首”的社的含义就是第二层含义，实际代表着一种古老的社区文化传统，无论是否被某个朝代的统治者定为一级行政管理组织，它作为一种“民俗社区”或“民俗聚落”始终存在于乡村社会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村传统的权力体系受到强有力的冲击，特别是许多固有的现象遭到批判和禁止，但摔跤这门古老的竞技，非但没有衰落或被淘汰，反而焕发出新的生机，并进入一个鼎盛时期。农村集体化使广大人民公社社员——农民，在《东方红》乐曲声中一起出现在广袤的田野，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中再一起消失于黄昏。他们几乎除了晚上睡觉外，每时每刻都以群体的方式劳作。在难得的劳动间歇，田间地头就出现两两成对、赤膊摔跤的场景。这种以群体方式出现的田间娱乐活动，不但调节了人们的身心，也使植根于人们心理深处的摔跤运动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延绵不息，摔跤技艺也得到创新和发展，更多的绕羊汉不断涌现出来。

在集体化生产方式的前提下，众多的跤手脱颖而出，而国家基层政权对绕羊赛介入又为这些跤手展示其技艺提供了一个广阔舞台。此时，传统绕羊赛的举办由原来群众自发、社区自行组织的模式转成了基层政权的一项职能，也就是组织权转入国家基层政权手中。早先的农村合作社和后来的人民公社及其下属机构大队成为绕羊赛的直接组织者和费用的提供者。它们在国家“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中，除组织传统庙会上的绕羊赛外，还有计划地组办了各类比赛，如村与村的对抗赛、公

社联赛、邀请赛等。由于国家对民间体育的重视,特别是1956年国家把摔跤列入正式比赛项目后,该地的传统挠羊赛,很快列为地方运动会的主要项目。在文革时代,传统古庙会废,“八个样板戏”取代了“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古装戏,可是唱什么戏似乎对人们无关紧要,散戏后的挠羊赛却是四邻八乡的人们所渴望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乡村挠羊赛更受地方政府的重视。在组织形式上,一方面以古庙会为依托、由村民自办的模式得以恢复;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为了发现和培养人才,每年也有计划地组织几次大型比赛。1980年在原平镇举办了三县挠羊盛会。从1983年开始,忻州市体委(前忻县,现为忻府区)陆续举办了四次“跤王杯”赛和两次五台山杯跤赛。此外,国家级和省级的摔跤比赛,如锦标赛、省运会、邀请赛等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先后在忻州、原平多次举行。在此,我们还有必要提一下为顺应时代的发展,挠羊赛不仅是以羊为奖品,也有以烟、布、铁锹、牛等为奖品的。如1957年,忻县烟村的高书文(后成为我国著名摔跤运动员和教练员)就在本县韩岩村庙会上获得摔跤冠军,为烟村农业社牵回一头母牛。文革时代奖品发生了质的变化,可以奖给挠羊汉一面红旗或一本毛主席语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奖品与社会的价值取向开始合拍,除羊以外还有自行车、缝纫机、收录机、摩托车、电视机等。

2 摔跤挠羊赛的主办与村落的凝聚及地位

考察一个村庄在周边地区村落中地位高低的指标是多方面的,如村庄中权力体系是否正常运转、村民整体文化素质、村民的富裕程度、有无考取功名或在外做官之人、村民对公共事务的关心程度等。而村民对公共事务的关心程度,即村民凝聚力,是考察村庄地位最重要的一项指标。村民凝聚力的强与弱决定着村中公共事务能否正常开展、村民能否按村规村约行事、为了村庄利益村民能否齐心协力等。村民凝聚力的培养,除依靠传统的教化方式,即“以保甲制为代表的官方教化组织和形式与以宗族、乡约为代表的非官方教化组织与形式”^①外。乡村公共事务活动的正常开展和村民的广泛参与客观上又起到了增强村民凝聚力的作用。

在忻州、定襄、原平,无论大小村庄,依托庙会而举办挠羊赛,都有一种自豪感,通过它不仅可以向外界展示本村风貌、树立本村形象,而且可以增强村民的认同感和增强村庄的凝聚力。凝聚力实际就是村民作为一个整体一致行动的能力,大部分村庄一年只举办一次庙会和挠羊赛。无论是普通村民还是村内有威望的长老、族长、士绅、村长等,为了使挠羊赛举办成功,达到预期的效果,实现神与人同乐的目的,他们都

^① 王先明、尤永斌:《略论晚清乡村社会教化体系的历史变迁》,史学月刊,1999年第3期,第105页。

会积极参与和精心准备。

凡是凝聚力强的村庄，主办庙会和挠羊赛时，村民能够提前进入角色，他们积极参与筹办活动，帮助组织者到方圆几十里甚至几百里范围内的村庄张贴注明举行挠羊赛的戏剧海报同时，叫闺女、邀女婿、安（忻州方言，意为预约）亲朋。对于赛事和庙会所需费用，他们决不吝啬，富裕者积极捐助，一般家庭也会按摊派主动地上缴到组织者手中，从而保证了庙会和挠羊赛的如期举行。

能否使本村跤场在周边地区形成巨大影响、吸引众跤手好汉前来参赛助兴、提高本村在周边地区的地位，除了赛事前的村民积极参与宣传组织工作外，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跤场秩序好坏和喝跤人是否公正无私。前文所提及的辛庄跤场，在民国年间之所以能在周边地区产生较大影响，并能吸引众多著名跤手前来参赛，除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相对发达的商业活动提供的条件外，良好的比赛秩序和喝跤人的公平公正所起的作用不容低估。该村村民在比赛进行时首先能够自觉地把跤场内圈让给来自周边村落的观众。该村和周边村落至今还广为流传着许多关于当年该村挠羊赛赛场上的真实故事。当年，该村维持跤场秩序的一个重要工具是放置在龙王旁的红棍（传说该村龙王与附近吕令村的黄驼神有姻亲关系，每年七月二十七庆贺龙王生日时，要请黄驼神，红棍是请神仪式中的重要器具）。来此观看摔跤的人，不论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不论本村居民还是亲朋好友，都必须遵守跤场规矩，如有违反就会受到秉承龙王旨意的红棍惩罚。据村民介绍，有一年跤场秩序出现拥挤混乱局面时，维持秩序者不得不动用红棍打在一个人身上，被打者大叫“打着你舅舅了”，得到的回答是“这是龙王爷的惩罚，我姥爷也活该”。另外该村居民还常常提及并引以自豪的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现的一位喝跤人本村居民张存根。他为人正直，敢于负责，在村中颇有威信。有一年，赛场上的一位跤手技术过硬、已连胜五跤，摔第六对手时他抓住对方的脚后跟摔倒在地，当观众连声叫好、认为本场挠羊汉非他莫属时，喝跤人张存根却大声宣布“破了”（挠羊赛用语，指当跤手连续摔倒四个或五个对手有望挠羊时被新的跤手摔倒），瞬间跤场乱了起来，人们认为喝跤人不公。张存根拿起五胜跤手的小指在油灯下让观众察看，指出“他小指先着地，这不是小指还带着泥？”观众和跤手都心服口服。^①

如果一个村庄村民凝聚力不强，跤场就有可能被乡村恶势力所控制。乡村恶势力指在农村打架斗殴、强买强卖、扰乱公共秩序的流氓无赖和凭借经济实力豢养打手、控制村政、欺压百姓的地方劣绅。他们利用赛事中的一些陋习和传统比赛规则中的漏洞把持赛事。这些恶势力为了显示自己的力量，威慑村民，使村民在日常事务中依附

^① 刘瑞芝：《忻府区高城乡永丰庄跤场访录》，稿本。

于自己；为了实现某种交易，或达到一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全面控制跤场，违背公平竞争的比賽规则。他们或买通喝跤人，或直接委派自己人当“喝跤人”，或指使其爪牙威胁参赛跤手，进行“串羊”（暗中串通，故意让某人获胜）的活动。跤手迫于压力，“听从”劝告，自愿退出比赛，或在跤场上故意认输。如果不听从“劝告”，执意上场，赢了则会受到暗算，输了就要遭到人格上的羞辱，脸上被黑布遮住，美其名曰“遮羞”，陪同骑马挂花的胜利者，在锣鼓声中，绕村一周，并在宴席上向胜者敬酒。

本来对于挠羊汉的特殊优待骑马挂花是跤乡长期以来的一种传统风俗，是对挠羊汉敬仰的具体表现形式，既反应了跤乡人民对挠羊汉崇拜的大众心理，也是举办赛事村庄树立本村形象的手段。个别村庄和社区地方劣绅控制跤场，公开进行“串羊”，迫使失败者“遮羞”、“敬酒”，显然违背了通过挠羊赛实现人神同乐的初衷。他们这种蓄意制造纠纷的行为不仅败坏了村庄的声誉，而且导演了跤场上的种种悲剧，使村与村、街与街、甚至县与县之间的跤手相互为仇。据老人回忆，大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一年原平镇农历七月二十二古庙会上举行盛大的挠羊赛，忻县、定襄、崞县（现改为原平市）几百名跤手参；由于赛事被恶势力把持，对失败者进行“遮羞”、“敬酒”等人格羞辱，结果引起众跤手和跤迷的不满，酿成上千人的斗殴事件。从此，原平镇农历“七月二十二”成为跤乡史上耻辱的一页，三县跤手结下世仇。^①

总之，村落凝聚的强弱及村落在周边地区的地位是摔跤挠羊赛的能否成功主办的关键，同时摔跤挠羊赛也反作用于村落的凝聚与地位。当一个村中的村民凝聚力丧失，在恶势力面前表现得无能为力时，跤场上就会出现徇私舞弊、制造事端等现象。如果权威体系运行正常，良好的跤场秩序和公平的比赛不仅可以增强本村村民的凝聚力，而且能够扩大本村跤场在外界的影响，并能进一步提高本村在周边地区的地位。

3 摔跤挠羊赛与乡村社会的教化

教化是“个人社会化的客观条件，是生物的人变成社会人的过程。一个人降生后，要成为一个社会的人，都将接受一定的不同层次的社会文化，经过家庭、家族、邻舍、社区及各类学校的教育、训练，逐步懂得一定的社会规范，成为服务于社区、社会群体的合格角色”^②。简言之，教化就是通过教育和训练使人们的思想符合既定的社会规范的过程，它为个人的行为奠定了思想基础，是个人一切行动的最初原动力。

传统乡村社会教化体系实际是一种二元同构性组织体系，即以保甲制为代表的国

^① 弓录怀（1932—）：原平镇张村人，现居原平城中。2006年2月18日采访记录。

^② 张光博：《社会学词典》，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07页。

家权力和基于各种传统组织、规范、礼仪所构成的各种网络基础上的一种权威，即美国学者杜赞齐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在乡村具体表现为以宗族、宗教、乡绅为代表的非官方权力体系。前者主要是为国家征收赋税和防范下层民众的反抗，而真正控制乡村秩序的是后者，前者往往必须与后者结合才能完成其使命。

乡村民众的传统信仰体系——民间宗教，是制约乡村社会秩序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忻、定、原地区来说，广泛流传着祖先崇拜、神灵信仰以及其他各种迷信风俗。祖先崇拜是宗族内部的传统礼俗，是维系家庭、宗族的基础。对各路神仙的信仰，包括儒、佛、道，则起着维系村民团结的作用，村民为它们塑像、建庙，举办各种盛大的迎神赛会。忻、定、原历史上各村究竟有多少寺庙无从考究，但可以说有许多寺庙都有庙会，时至今日人们对庙会依然是情有独钟。庙会“既是娱神，又是娱人的活动，它可以将不同经济利益、社会身份、社会背景的社区成员融合在一个共同体中。‘社会’是一宽泛的概念，只有当村民共同参加一个仪式时才能体现出他们同属于一个社会”^①

忻、定、原地区的传统摔跤挠羊赛正如前文所述与庙会相伴而行，庙会期间社家是否举行挠羊赛，以戏台两侧所插三角形纸制小旗为标志，俗称“跤旗”，上书“英雄跌对，跌死无罪”。有意参赛的就要根据自己家住地域拉帮结派组织队伍，并派曾经挠过羊的跤手出来拔取跤旗。两面跤旗被拔表示两支参赛队伍已经形成。随后“社家”要对双方的实力进行评估，并与他们共同商定双方的势力范围，一般以公路、铁路或河流等为界。自然形成的两支队伍如何排兵布阵就落到了各自队伍中那些年龄较大、跤场经验丰富的老跤手身上，这些人成为临时的教练和领队。比赛是就地进行，不限时间，跤手不穿跤衣。比赛严格遵循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规则，除脚以外身体的任何部位着地为输，一跤定胜负，摔倒五个称“好汉”，摔倒六个为挠羊汉。每场赛事一般都要举行两轮比赛，俗称“头羊”和“二羊”。头羊含有培养下一代跤手和对阵双方“演习”的成分；而二羊则是高手上场，偏重于提高和实战，所以比赛更加激烈、精彩，当地跤迷有“不怕误了挠头羊，单怕误了挠二羊”的说法。整个比赛规则都是约定成俗的，正如传统乡村社会的秩序维持一样，是一种“礼俗社会”，并没有正式的规范和法则。而且在不同的村庄之间，也存在着一些不同的习惯，如原平镇的挠羊赛规定，挠羊人必须是有名望的跤手，于是在比赛中就出现了裁判（俗称“喝跤人”），也必须是观众和跤手认可的，对脱颖而出的新手百般刁难。曾为忻州最大跤场的辛庄跤场，为了使裁判公正，本村跤手不得参赛。组织者的权威就是来源于这些传统的约定

^① 赵英霞：《乡土信仰与异域文化之纠葛——从迎神赛社看近代山西民教冲突》，清史研究，2002年第2期，第72页。

俗成的习惯，他们与跤手依此来维持赛事的正常进行。

由于该地区传统摔跤是就地而行，没有时间限制，在动作上除不能打击对方和抓对方的阴部外再没有严格的限制，于是经常出现跤场意外事故，如摔残、摔死。然而，从本人调查所获资料和地方人士所写的有关文字材料中发现，很少有因此而发生的跤场闹事，大部分跤场能够在突发事故发生后仍井然有序地继续比赛。这除了当地人们对摔跤具有共同的心理认识和跤旗上的“英雄跌对，跌死无罪”这一约定俗成规则的制约外，传统信仰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庙会既是娱神，又是娱人的活动，挠羊赛作为其重要内容，主办人、参赛跤手和观众的行为就必然受到人们所祭祀对象——神灵的制约。虔诚的人们火烛小心，惟恐冲撞神灵给自己带来灾难。忻州的辛庄村挠羊赛是每年农历七月二十七日龙王庙会期间举行，是庆贺龙王生日。龙王便成为一个有形而无形，无声而有声的庙会和跤场的控制者。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在辛庄跤场上，忻州石家庄村（有说是南高人）的谭六摔死了定襄县西营村一人，^①当有人提出摔死人谁来负责的问题时，得到的回答是“找龙王爷负责”，赛事继续进行。^②这里负责者是龙王，在当地人们心目中它是无所不能的。如果有人让他在生日时感到难堪，势必会给此人带来灾难。因此任何人都必须克制自己的行为，达到与龙王同乐的目的。

摔跤挠羊赛植根于忻州、定襄、原平的民众生活之中，是当地最重要的社会风俗之一。他本身也是一种面向大众的、广泛而生动的教化活动，他在创造着一种文化，传承着一种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一方土地上庄稼人的气质与心理，制约着人们的行为。

在忻、定、原的历史上没有上过其他赛场比拼的男人比比皆是，而没有摔过跤、不懂摔跤和没有看过挠羊赛的男人却寥寥无几。成年男人在日常闲暇时在一起研究摔跤、探讨摔跤和相互过招，必然对小孩产生影响。小孩在七八岁时就受到成年人的悉心指导。他们效仿大人，在游戏中也要“挠羊”，“挠羊”的孩子便无可争议地成为“孩子王”，而且有机会在挠羊赛场上展现自己。然而，要真正成为三乡五里甚至二州五县有名跤手，需要的是坚定的意志和超常的付出。相传，民国十四、五年时，忻县一卖菜汉子，五大三粗，绰号“菜团长”，凭借力气多次挠羊，不料两年后被忻县部落村的胡黄堂取而代之。胡黄堂绰号“小狐子”，初上跤场时多次败在“菜团长”脚下。之后，“小狐子”苦练二年，几经琢磨，终于找到了对付“菜团长”的办法，在一次庙会上将“菜团长”重重地摔倒在地上。从此小狐子独占忻、定、原跤场六、七年之久。到

^① 《忻县志·体育卫生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

^② 刘瑞芝：《忻府区高城乡永丰庄跤场访录》，稿本

民国二十年前后，绰号为“大簸箕”的高四狗由于多次输给“小狐子”，闭们不出，在家苦练三年，终于在三十岁时报了“一箭之仇”，取代“小狐子”而称雄忻州跤坛。

既然挠羊赛是在乡村社会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的，跤手和赛事就必然受到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民生活方式的制约。农民出于个人业余爱好，在耳闻目睹和参与、摸索中成长为跤手和挠羊汉。跤手和挠羊汉不同于戏班和八音会的演员或八音会艺人，必须接受班规，并拜师学艺，在师傅的严格训练下才能登台演出。跤手或挠羊汉没有组织属性，没有帮派之分，不受清规戒律的制约。他们之间没有严格的师徒关系。他们的技艺不是来源于规范的教程，而是得于赛场上相互交流、模仿并加以创新的结果。跤手是否参加挠羊赛纯属个人行为，无需向谁请示汇报。跤手所具有的这些特点，实际就是传统农业社会中农民的生产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反应。历史上的农民，生产技术完全是经验的积累，生产劳动纯属个人行为。由此我们可知，是乡村社会教化出一代又一代的跤手和挠羊汉。

众所周知，在明清时期山西人就把能否“业商”看作子孙成人的一个重要标准，正如山西学政刘於义在上奏中称：“山右积习，甚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以故士风卑靡。”^①而在忻、定、原，人们则除秉承重商之风外，更看中摔跤对下一代的“教化”作用，把摔跤作为进入商界前的必修课。摔跤，作为一种个体之间的激烈对抗，体魄力量虽是取胜的首要条件，但要成为优秀的跤手或挠羊汉，更重要的是技巧和临场的应变能力，这两种能力的取得靠的是思考、揣摩、经常出入正式或非正式的跤场。在挠羊赛场上，两个阵营如何排兵布局，都的精心策划，需要集体的智慧和谋略。从跤技的揣摩、习练、掌握、运用，到跤场的实战、较量、拼搏，再到整个阵营的运筹、布阵，无不是对参与者个人潜能的挖掘、智力的开发，无疑会对一个人的人生道路产生强有力的影响。忻州地方文化名人田昌安先生撰写的《忻定原跤乡文化探本》中，指出“商场如战场，跤场如商场”，“跤场与商场都是人生的战场”，跤场上养成的知己知彼、扬长避短、随机应变的素质无疑会对以后“业商”产生无形的影响，所以他认为晋商的后起之秀“忻州帮”和“崞县帮”在清末到民国初年的崛起，与摔跤运动的广泛开展不可分割。^②

第三章 摔跤挠羊赛与乡村社会的生活

摔跤挠羊赛是忻、定、原地区长期存在并延续发展的民俗文化现象，属于乡民生

^① 《朱批谕旨》十五涵二册《朱批刘於义奏折》，乾隆三年武英殿本。转引自安介生：《山西移民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6页。

^② 田昌安：《忻定原跤乡文化探本》，稿本。

活文化之一。它深深扎根于人们心灵深处，成为影响人们行为规范、价值评判、生活方式的主要因素。

1 民众对摔跤挠羊赛广泛的参与

“立了秋挂锄钩，吃瓜看戏跤场游（唱戏挠羊放牲口）”这一俗语充分体现出当地人对挠羊赛的挚爱和向往。它是一种原始的、无形的超越行业分工的，人们普遍向往的并能震撼大众心灵的力量。它把原本互不相干的人们吸引到了一起，凝聚到了一起。在忻、定、原的摔跤史上，每一场赛事究竟有多少跤手和观众参与，虽没有确切的记载和统计，但正如前文所叙没有摔过跤的成年男人和没有看过挠羊赛的人寥寥无几，民众的广泛参与成为它的一个重要特征。

挠羊赛场上的跤手和挠羊汉是人们对摔跤运动的普遍参与的前提下涌现出来的佼佼者，但他们不像戏班演员和鼓手班（即八音会，同样盛行于忻、定、原的一种极具地方特色的民间艺术）中的吹鼓手，并没有把摔跤当成安身立命和养家糊口的专门职业，是摔跤这一民俗活动把他们推上挠羊赛赛场，增强好胜的人类本能使他们成为当地有名的跤手和挠羊汉。他们是以农民为主体来自各行各业之人，他们从事的职业多种多样，除种地的以外，有卖菜的、牧牛的、放羊的、赶脚的，有泥匠、木匠、铁匠，有长工、店铺伙计、小贩，除此之外，还有个别教书的、唱戏的及富商子弟。下面表格是我依据一些调查资料和文献对民国年间忻县和原平部分著名挠羊汉的情况统计。

民国年间忻县部分著名挠羊汉统计表^⑥

姓 名	绰 号	所在村	职 业	第一次挠羊	影 响
	菜团长	忻县樊野	卖菜的	民国十四或十五年	两年
胡黄堂	小狐子	忻县部落		民国十六年	独占忻定崞三县挠羊汉六、七年之久。
肖计全	大簸箕	忻县段家庄		民国二十年	
高四狗		忻县晏村		民国二十年	大约民国二十三年把小狐子摔下跤场，成为一代跤王。
王二	醋糟囤	忻县真檀村		民国二十年	两年
焦计全		忻县南肖村			一双铁腿，称雄跤场
苏四		忻县芝郡		民国二十五或二十六年	
	毛猴	忻县芝郡		民国二十五或二十六年	

^⑥ 资料来源于忻州摔跤俱乐部展厅。

俏玉子		忻县芝郡		民国二十五或二十六年	
孔焕寿		忻县西楼		民国二十五或二十六年	
郭英堂		忻县代郡		民国二十五或二十六年	
史满宝		忻县高村		民国二十五或二十六年	名声传遍二州、五县
龙四		忻县卢野		民国二十五或二十六年	
赵铁猫		忻县安邑		民国二十五或二十六年	

民国年间原平部分著名挠羊汉统计^①

姓 名	绰 号	所在村	职 业	第一次挠羊	影 响
张补米	崞县小辫	原平下王庄	赶脚、保镖	清朝末年	忻县、定襄、原平
史喜	半挂车	原平北贾村	赶车务农	民国初年	忻县、定襄、原平
张吉保		原平镇		民国初年	忻县、定襄
陈四保		原平沙晃村		民国初年	
张喜中		原平班村		民国初年	忻县、定襄、原平
邸绪堂	油篓	原平大牛店	做油篓生意	民国初年	
常保亮		原平镇		民国初年	忻县、原平
乔四关		原平大库狄村		1917 年	
樊福劳		原平镇太平街	当铺学徒	1920 年	忻县、定襄、原平
姜宝贵	活宝	原平沙晃村	长工、短工	民国初年	
王福贵		原平沙晃村			忻县、定襄、原平
杨全治		原平下王庄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忻县、定襄、原平
武二贵		原平下原平村	木匠，赶脚		
张喜兔		原平东泥河村	泥匠		原平西南部村镇
李召祥		原平武彦村人			
李棒生	小棒生	原平武彦村人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张再福		原平班村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	忻县、定襄、原平
王洪		原平阳房村人	教员	1938 年	

^① 资料来源于张金锁编著的《原平胶坛风云人物》，山西省美术印刷厂 2000 印。

任虎绪		原平下薛狐村		1943 年	
吕栓堂		原平西柴华村		1944 年	

其间，定襄同样是跤手济济，挠羊汉层出不穷，如张满吕、张银苟、李二猴、张兔灯、贺来年、贺文富等。

在忻、定、原这块土地上，历史上都曾有过一些书香世家（如忻州曹村崔氏父子同朝进士、定襄待阳村赵家一门三进士同室四显臣）、商业巨富（如清末到民国年间忻县的“郃、王、张、陈、连、石”六大富商）和享有声誉的梨园世家（如忻县忻口村父亲“云遮月”和儿子“五月鲜”、“十二红”、“六月鲜”同为北路梆子名角）。然而常年不断、经久不衰的挠羊赛，不但造就出一个个挠羊汉，而且还形成了众多的“摔跤世家（或家族）”。忻县有“南崔北赵”，即奇村镇南高村的崔家和义井乡北胡村的赵家。原平有太平街的晋家（晋子扬、晋世、晋海、晋山）、下原平村的武家（武还治、武申虎）、解村的王家（王长富、王玉科、王开科、王来科、王旭田）、西镇乡前沙城村的张家（张润堂、张文锁、张宏伟、张国伟）、郑家营的刘氏（刘有同、刘有亨、刘有贵及其父刘全明）。定襄有宏道镇留念的朱家（朱上槐、朱富山、朱彦青、朱彦国、朱彦德、朱彦举）等。^①

这些“摔跤世家（或家族）”和挠羊汉从事的职业多种多样，是挠羊赛把他们这些本互不相干的人吸引在一起，是挠羊赛使他们在乡村中从原本是普通人一下成为知名人物。他们似乎不及“书香世家”、“官宦子弟”尊贵显耀，也不象富商巨贾那样财大气粗，更不及“梨园世家”名声响亮，但他们却受到乡民的爱戴和尊重。某位跤手一旦挠了羊，成了挠羊汉，便会“一夜成名”，他所在村庄的人都会将其看作是本村的光荣和骄傲，小孩更是将其当作崇拜的偶像。

挠羊赛遵循的原则是跤手按水平高低、从小到大、由低到高的顺序出场，使不同实力、不同水平的跤手都有机会上场，以达到跤手的广泛参与。比赛一开始是小跤手开路，叫“扑拉露水”。那些受过成年人悉心指导、效仿大人在游戏中进行“挠羊赛”挠了羊的孩子就有机会在挠羊赛场上展现自己。之后逐步提高，直到成年跤手出场。挠羊赛还有一条规矩是要一直摔到天亮，所以“头羊”（首轮比赛）以后，要挠二羊。这使一些挠头羊时失去上场机会的跤手机会大大增加。而且，二羊参赛跤手一般实力较强，在跤手心目中“二羊”分量要重于“头羊”；跤迷也更看重二羊，故有“不怕误了挠头羊，单怕误了挠二羊”的说法。

^① 资料来源于忻州摔跤俱乐部展厅。

除了跤手外，观众是举行挠羊赛的必备条件。在举办庙会和挠羊赛前夕，举办村村民积极参与筹备工作。挠羊赛场上的观众更来至四乡五邻，他们不辞辛苦，从四面八方走到一起有七、八岁的小孩，有耄耋老人，有大姑娘小媳妇，有身怀六甲的孕妇。有一些人虽不会摔跤，但对摔跤爱的真诚、爱的发狂、爱的入迷，有人把他们称为“铁杆跤迷”。比赛前夕，他们是“联络员”和“密探”，积极招集属于本阵的跤手，探听对阵方实力。比赛开始后他们又是服务员，抱衣服、倒茶水。

2 摔跤挠羊赛与乡民的娱乐狂欢

赵世瑜在《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一书中认为中国传统庙会的狂欢精神具有原始性、全民性、反规范性等特征。他指出“所谓狂欢精神，是指群众性的文化活动中表现出的突破一般社会规范的非理性精神，……常常表现为纵欲的、粗放的、显示人的自然本性的行为方式。”^①忻、定、原的民间日常摔跤和它的比赛形式——挠羊赛，是人们日常生产生活和庙会中的群众性竞技娱乐活动。挠羊赛可以说是当地庙会的压轴戏，它把庙会中人们所追求的狂欢精神发展到一种新的境界，全面显示了人的原始的、纵欲的自然本性。传统道德的约束和“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单一生产生活方式下的广大农民，无时不在凭借他们的智慧和力量寻找和创造机会和方式，来调节他们单调的生活。庙会为他们提供的参与迎神赛会、观看歌舞戏剧表演，使他们借助神灵之力尽显了情绪的狂放。而忻、定、原的挠羊赛作为庙会的压轴戏，是当地庙会狂欢活动的顶点。

争强好胜是人类的自然本性，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表现和炫耀自己的欲望，在生活中我们常见的一些民间竞技，如扳手腕等，无不含有这样的动机和意识。而摔跤既是力量和体魄的搏击，也是智慧和技巧的比赛，亦是意志和毅力的较量，正好满足了人们表现自己的欲望。这种原始本能的体现，在日常生活和庙会的挠羊赛场上则表现为全民性、反规范性。在忻、定、原一带，广大农民在劳动之余、明月之夜、夏日饭后、冬日闲暇，不需专门组织，也不需专门的场地，或地头、或街头、或打谷场、或河边沙滩，常常三五成群，摆开架势过几下跤瘾。这既是人类原始本能的体现，也是开心解乏的游戏，亦是正式踏上挠羊赛场前的演练。

同所有竞技、娱乐活动一样，依托于庙会而举办的挠羊赛也是一个跤手与观众的互动过程。就跤手和挠羊汉来说他们来自以农民为主体的各个行当，没有把摔跤当成安身立命和养家糊口的专门职业，是挠羊赛把他们这些互不相干的人吸引在一起，凝

^① 赵世瑜：《狂欢与日常》，北京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116 页。

聚到一起。上了跤场，他们又表现得粗犷豪放、不畏艰难，是普通百姓人性的尽情释放，是庄稼人生命力的充分彰显。他们那扣人心弦的比拼、各具特色的跤技，给观众带来的是欣赏的快感和身心的愉悦，给单调的乡间生活注入勃勃生机。

妇女虽受传统文化的诸多限制，不能像男人那样常常能得到过跤瘾的享受，然而他们却成为赛场上忠实的观众。在传统社会，妇女深受封建礼教的种种束缚，男女有别、授受不亲是人们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仅是光绪版《忻州直隶州志》，所载烈女节妇就达 918 人^①，可见跤乡农家的闺教也是相当“成功”和“有效”的，跤乡女子也是相当循规蹈矩的。可是，每逢挠羊赛举行时，便破了这千年的礼禁，大姑娘、小媳妇甚至孕妇便三个一伙、五个一群争着往人群里钻。这一切，家长“纵容”，社会认可，没人说他们不守“妇道”。实际上日常生活中男孩子以摔跤为游戏，并得到长辈悉心指导的同时，女孩也在研究摔跤、学习摔跤。她们被挠羊赛场上那激情的狂欢场面深深吸引，也有冲破束缚上场比拼的心理，而跤乡的男人们对女性渴望参与摔跤也是认同和理解的。民国初年，当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观念在多数地方还属知识分子专利的时候，跤乡的那些身上沾满黄土的农民却走在了其他地区的前列。此时，号称忻州最大跤场的辛庄跤场就率先推出女子挠羊赛。^②

对于中国传统庙会所具有的全民性狂欢特征，赵世瑜的《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一书中已作了详尽的论述，在这里我要说明的是庙会全民的狂欢是有限性的，也就是说仅在三五日内人们可以“不分贵贱”、“男女混杂”尽情欢娱。而在忻、定、原，以庙会为依托的摔跤挠羊赛却是日常大众狂欢精神的焦点，它不同于巴赫金民间狂欢理论中提到的狂欢节期间建立起来的世界，是作为对日常生活，即非狂欢生活的戏仿，是作为“颠倒的世界”而建立的。^③在跤场上比拼的跤手无一不是日常与人过招中的佼佼者，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的观众哪个不是酷爱摔跤、懂得享受摔跤欢娱的人。

尽管男女老少聚集在跤场时各有不同的心理目的，如忻州摔跤俱乐部的胡竟仑在《跤乡颂》中提到“老汉看跤看门道，哪个后生有绝窍。老太看跤心圪挠，宝贝儿子别伤着。后生看跤看破绽，上场破跤不蛮干。媳妇看跤暗祈祷，孩子他爹把羊挠。姑娘看跤眼睛瞟，心中暗把情郎挑。小孩看跤看热闹，扑拉露水学跌跤。”然而，他们在赛场上的表现，正如尼采论述古希腊酒神精神所代表的非造型艺术给观众的节日狂欢

^① 田长安：《忻定原跤乡文化探本》，稿本。

^② 雷鸣：《忻州摔跤文史资料汇编》，忻州市摔跤俱乐部 2005 年印，第 61 页。

^③ 巴赫金：《拉伯雷研究》，李兆林、夏忠宪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版，第 13 页。

感受一样，是“人的个体化原理崩溃之时从人的最内在的基础即天性中升起的充满幸福的狂喜”，“……他们的公民经历和社会地位均被忘却，……出现的却是一群不自觉的演员，他们从彼此身上看到自己发生的变化”。^①另外，从群体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一个心理群体表现出来的最惊人的特点就是“构成这个群体的个人不管是谁，他们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或智力不管相同还是不同，他们变成了一个群体这个事实，便使他们获得了一种集体心理，这使他们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变得与他们单独一人时的感情、思想和行为颇为不同。”^②这样的情景与挠羊赛上从四面八方走到一起的那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非常相似，他们忘记了自己的地位、身份和性别，因精彩的搏击场面而叫好，为自己所崇拜的跤手而欢呼。这样的狂欢场面远远超越了单纯的庙会狂欢境界，成为一种疏通人们心理阻塞的主要渠道和方式，使人们平时受压抑的心理得到全方位的调节。

3 摔跤挠羊赛与乡土话语

乡土话语是指流行在特定的区域内，人们用特定的方言语汇来表述特定的民俗现象的民间用语，是社会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特定区域民间流行的谚语、俗语、歇后语、行话、隐语、忌讳语、谜语、顺口溜、逗引语等等。它源自于区域特定的民俗现象，直接反映民俗，是民俗的文化载体，是历史的产物。反过来，特定的民俗也反映着特定区域乡土语言的变迁。

忻、定、原素有“摔跤之乡”的美称，摔跤是该地区民俗文化的特有表现和主要娱乐方式。伴随着摔跤运动的盛行，在民间产生了成套的有关摔跤的词汇、谚语、歇后语、跤手绰号、渲染比赛气氛达到娱乐之目的逗引语等。这些语汇，可以说是口耳相传，妇孺皆知。它们担负着承载这一特有的民俗现象和折射当地人的行为规范、价值评判、生活方式的使命，大体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比赛用语。摔跤，忻州方言叫“跌跤”，闹着玩叫“瞎跌”，在庙会期间，有组织按一定规则的比赛，因传统奖品是羊，所以叫“挠羊赛”，“挠”是扛的意思。庙会期间举办挠羊赛的标志是“跤旗”，拔取跤旗的人叫“应羊人”，通常由久经跤场的挠羊汉充任，是赛事对阵双方的组织者和召集人。比赛的主持方叫“社家”。现场解说、审查跤手资格、确认跤手上场的时机与动机是否与赛事宗旨相符、判定胜负叫“喝跤哩”。比赛过程中，由于双方对阵实力悬殊，但按规矩必须出场应付，这种以“羊”

^① 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5、32页。

^②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送“狼”的弱势应战现象叫“喂羊”，这样的跤手叫“喂羊货”。彼此熟悉的挠羊汉分别代表自己一方交战时，事先商定由谁挠羊，形成场上摔假跤的舞弊行为叫“串羊”。技术不错，反应快，脑子灵活，能看出对手破绽，针对已胜四五跤的跤手的技术特点使出自己的绝招破解对手，但一般挠不了羊的人，叫“破茬儿”。比赛到白热化时，最有实力的跤手上场，起到力挽狂澜和起死回生的作用，力保“羊”归我者叫“保羊汉”。在挠羊赛最初阶段先让小孩上场摔跤，为其提供实战机会，培养后备人才称“扑拉露水”、“打露水”、“打茬儿”、“出马枪”。在比赛的中间阶段，是技术尚不成熟的跤手较量阶段，或比赛时不分甲、乙双方对阵，而是在场的跤手根据场上的情况随时自愿上场的一种比赛，称为“跌混跤”。在比赛中双方选手实力相当，都采取防守战法，不冒然使招，相持时间较长，称为“熬油”。连续摔倒五个跤手的为“好汉”，能连胜六个对手的就是冠军，称“挠羊汉”。为了满足观众的兴致和要求，组织者一般要在一晚上安排两场比赛，第一场叫“挠头羊”，第二场叫“挠二羊”。

第二，摔跤动作用语。此类属于方言性的摔跤专业性词语，在此为说明问题仅列部分代表性的词汇。比如：抱住对手的腿将其摔倒，叫“扳腿”；用脚横踢对方的脚，叫“泼脚”；紧握对方一只手，迅速转身将对方背起并摔倒在前面，叫“大背子”或“狼背娃娃”；头钻入对方跨下，双臂紧抱对手的大腿，将其向后摔倒，叫“大过肩”；对面紧抱对方腰部，并用小腿勾住对方小腿，将其摔倒，叫“大坎子”；当对手抱住自己腿时，迅速抱住对方的腿将其摔倒，叫“倒扳腿”；对面双臂紧抱对方的腰部，一腿绞住对方的一条腿，将其仰面摔倒，叫“对面绞子”；双臂从两侧紧紧夹住对方的脖子，叫“驴夹脖”；弯腰扳回对方的腿，叫“搂腿”；一臂迅速插入对方腋下，并抱紧后背，叫“掺肩臂”；两臂抱紧对方腰部，并将其摔倒，叫“四把楼腰”；突然抱住对方双腿，叫“双搂腿”；当对方把手伸过来时，顺势一手推住对方的臂，一手扳对方的一条腿，叫“顺手牵羊”；双方立着摔的架势，叫“上架子”，弯着腰，叫“下架子”；因力量悬殊，蹲下来与站着的对方摔，叫“让圪蹴蹴”；因力量悬殊只用左臂、左腿或右臂、右腿与对方摔，叫“让一半半”；双方弯腰相互紧握双手，一方猛然把对方摔倒，因摔倒者似鸡食后在地上磨嘴的动作，所以叫“鸡儿磨嘴”；猛然下蹲，一臂插在对方的两大腿间托住屁股，头抵对方腰部，另一手紧握对方一手，叫“小穿”；从背后紧抱对方腰部，叫“后抱老爷”；一方猛扑上去紧抱对方上体，并将一腿搭在其腿部，叫“野背子”；此外，还有“铁板桥”、“穿裆靠”、“架梁踢”、“鬼缠腰”、“地爬虎”、“抵羊碰蛋（即阴囊）”、“提勾夺叉”、“玉手夺蔓篙”、“揪手扳脖子”、“扑脚带钩子”、“刹手野钩子”、“一插一抱手钩子”等动作名称。

第三，比赛现场解说词和跤手的绰号。喝跤人，也是比赛现场解说人、跤场欢乐气氛的制造者。现场解说词主要来自人们创造的各种动作名称，如前面提到的“后抱老爷”、“驴夹脖”、“让圪蹴蹴”、“鸡儿磨嘴”等；有的来自跤手的外貌特征、个人秉性及其绰号，如菜团长、小狐子、小狗子、大簸箕、醋糟囤、毛猴、半挂车、三斤半莜面、二十四个窝窝、毛驴子等。喝跤人那插科打诨的解说令人捧腹大笑。“嘿！这一位长的象‘愣头青’，这一位咋看也是个‘气门芯’。愣头青遇上气门芯，谁输谁赢大伙可得看分明……咳！你看这愣头青，猫倒腰就来了个山羊抵蛋，气门芯却使一个顺手牵羊，没招架愣头青耍开了狼叼死娃子，气门芯呀你真是气门芯，咋就摔了个蛋（指阴囊）迎天。”^⑩虽口出不雅，但跤手习以为常，观众捧腹大笑，对阵双方激烈紧张的气氛顿时消融。

除以上三类外，还有与摔跤挠羊赛有关的谚语，歇后语等俗语。它们有体现人们对摔跤的酷爱、钟情的，如“唱戏不跌跤，瞧的人就少；唱戏又跌跤，十里八村也来瞧”；有反映挠羊赛举办的季节的，如“立了秋挂锄钩，吃瓜看戏跤场游（唱戏挠羊放牲口）”；有说明挠羊赛先小后大，先弱后强的比赛规矩的，如“不怕误了头羊，单怕误了二羊”；也有记录跤手强弱情况的，如“菜团长遇上小狐子——没治”。

以上摔跤挠羊赛词语，都来自民间，没有丝毫加工修饰的痕迹，文字质朴，乡土气息极浓，是民众共同智慧的结晶。它们中的一部分直接来源于乡民的生产生活，如比赛中一系列与羊有关的用语，像“挠羊”、“应羊”、“保羊”、“破羊”、“串羊”等；一部分是对摔跤实践经验的总结；至于跤手的绰号，则是对他的外貌特征、个人秉性的反映。这些摔跤所用词语使挠羊赛得以传承的同时，形成了该地区特有的乡土语言风格，即人们在生活中把摔跤挠羊赛的一些用语的涵义进一步引伸，来阐述民众的一些行为方式，如一个人瞧不起另一个人时，会说“他那两下，我‘让一半半’”。对一个人外貌特征作出评价时，往往会说“看那架子”。一个人能力有限，但不听别人劝告，固执地要与别人在某事上竞争，注定要失败时，人们往往称他为“喂羊货”。能力很强之人在某事上对付能力较差者，并取胜时，往往会说“我小串他了”。

4 摔跤挠羊赛与乡村社会的价值观念

由于传统中国社会长期把科举取士作为选拔官吏的主要手段，使“学而优则士”、“金榜题名时”成为人们实现人生价值的标志，普遍形成了重文轻武的社会价值观念。以近代华北为例，满铁调查中河北沙井村教员赵斌对士绅资格的定位：“问：什么样的

^⑩ 资料来源于忻州摔跤俱乐部展厅。

人能成为乡村绅士呢?答:有学问、在公众场所善于言谈、人格高的人。问:绅士是有钱人吗?答:不是。绅士是有学问和人品好的人,没有特别规定在金钱方面有何要求。问:李如源是绅士吗?答:他只是人格好,没有学问,不能称为绅士。问:村长为什么不能称为绅士?答:因为没有资格。绅士的资格是有学问、品行端正、能办公事、为民众带来利益的人。问:现在吴氏这个人怎么样?答:也不能称为绅士,因没干过公事。……问:张瑞家有九十亩地,是村中最有钱的人,是绅士吗?答:张瑞被称为最有钱的人而不是绅士”。^①可见一个人有无学问是其社会地位高低的重要标志。学者在对近代乡村社会分层问题论述时指出“建立在乡村成员社会意识基础上的社会分层可依次区分为‘士绅领袖’阶层、‘能力型’阶层、‘普通民众’阶层、‘劣势’阶层”,^②这一论述表达了传统乡村社会民众视野中乡村社会分层的普遍特征,然而各地区域文化的特殊性又使区域内民众的社会特征表现出个性特征。实际上对乡村社会价值观念的解读,需将其植埋于乡村特定的文化脉络中去理解。杜赞奇在定义“权力的文化网络”时指出:“文化一词是指各种关系与组织的象征与规范,这些象征与规范包含着宗教信仰、相互感情、亲戚纽带以及参加组织的众人所承认并受其约束的是非标准,”^③乡村社会价值观念是乡村民众在长期生活实践中不断沉积的对社区内不同群体的区划和社会地位的确认,它深受特定的文化情境与社会环境的影响,评价准则深嵌于乡土社会的文化环境中。

由于特定的文化背景,文武并重成为忻、定、原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念。一方面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念深深影响着忻、定、原的人们,“金榜题名,光宗耀祖”是人们实现人生价值的标志,从而形成了忻、定、原重文的文化环境。以忻州为例,既有金元文化巨匠元遗山,也有学继遗山,直追前贤的后世英才。具不完全统计,仅清朝一代,忻州举人、进士就多达数百人,出现了一批有很大影响的书香世家和文化村落。如曹村的崔氏,南肖村的焦氏,安邑村的赵氏,麻会镇的史氏、马氏、王氏,董村镇的杨氏、刘氏、郝氏等。^④然而,忻、定、原地处“晋北孔道”、“三关总要”的位置,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在长期的战乱环境下,为了生存就必须有健壮的身体和御敌自卫的本领,又使这一地区形成民风尚武的社会风气,并造就了忻州东楼张氏一门在嘉庆年

^① 中国农村惯行调查(1),东京岩波书店,1981年,第96、373-374、96页。转引至《乡村民众视野中的社会分层——以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初的华北乡村为例》。渠桂萍、王先明,人文杂志,2004年第6期,第124—125页。

^② 渠桂萍、王先明:《乡村民众视野中的社会分层——以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初的华北乡村为例》,人文杂志2004年第6期,第124页。

^③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页。

^④ 周如璧:《忻州魂》,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92—196页。

间三兄弟（万里、万方、万邦）同榜中武举的奇迹。^①

摔跤挠羊赛作为尚武风气演变的结果，长期盛行于该地区的广大乡村，反过来又必然会对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念产生强有力的影响。

首先是人们把会不会摔跤、敢不敢摔跤、敢不敢上跤场视为衡量一个男子汉有无勇气和胆量的无形标准，且形成一种思维定势。一小伙子如果不是因为身体有病而不敢摔跤或不会摔跤，便会被人们视为胆小、懦弱，受到人们的歧视。一个人的成长已离不开摔跤，摔跤已成为男子汉必然经历的人生洗礼，成为一个人走向成熟的必修课。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往往对摔跤中出现的过激行为表现出理解和谅解。我们中国人教子的传统思维是棍棒之下出孝子。然而，当孩子们因摔跤导致撕破衣服、鼻青脸肿、磕破脑袋时，他们无须当心家长打骂，至多是充满爱意的一两句责备。甚至因摔跤耽误了家务、农活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也会得到谅解。在忻州奇村一带，广为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天几个放羊娃和几个放牛娃在云中河畔“厮杀”在一起，他们跤兴大发，直摔得忘记了牛羊，结果一大片刚刚吐穗的谷子被牛羊啃了个精光，谷地主人知道是孩子们只顾摔跤而忘了牛羊时，怒气顿消，摇了摇头、叹了口气也就罢了。^②

其次是挠羊汉在乡村社会中享有特殊的地位。忻、定、原的传统乡村社会乡民心目中的乡村社会分层除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士绅领袖”阶层、“能力型”阶层、“普通民众”阶层、“劣势”阶层”外，由于其特定的文化背景——摔跤挠羊赛的长期盛行，出现了游离传统阶层之间、不能简单地划入某个阶层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挠羊汉。所谓“挠羊汉”，是指在摔跤挠羊赛场上凭借他那健康而充满激情的体魄、风姿卓约的动作、独特而富有创造性的跤技、连续摔倒六位跤手的人。挠羊汉是一个村中的特殊人物，在整个跤乡他们又构成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他们本身具有惊人体力和个性特点，无疑会对村中事务和社会秩序产生影响、发挥作用。他们在乡村民众视野中处于乡村社会的什么地位，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他们在成为挠羊汉或著名跤手之前，大部分是乡村普通阶层的成员，在乡村社会没有多大影响，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摔跤爱好者。一旦挠羊身价倍增，他的名字迅速在本村和邻村乡民中得到传播，一夜之间社会地位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一变化不是表现在职业的改变、经济实力增加或参与村庄公共事务，而是表现在对乡村社会产生的影响上。

挠羊汉在三乡五里甚至二州五县享有盛名，成为人们崇拜的偶像，颇受人们的尊重。人们将其视为本村的光荣与骄傲，为之激动和自豪。他以自己实实在在的行动、

^① 周如璧：《忻州魂》，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92 页。

^② 周如璧：《忻州魂》，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7 页

超乎寻常的付出、富有特色的跤技给跤乡的人们带来欣赏的快感和身心的愉悦。

挠羊汉地位和作用的特殊性,使我们很容易联想起英雄人物。什么是“英雄”呢?我国的《现代汉语词典》和英国的《牛津词典》都曾下过专门的定义,不论东西方,大家都对“英雄”达成如下几点共识:一是要有超人的本领,二是要有独特而高贵的气质,三是要有勇赴“国难”、敢于牺牲的精神。朱光潜说:“英雄本是一种理想人物。一群人或一个人所崇拜的英雄其实就是他们的或他的人生理想的结晶。”^①在跤乡的人们看来,挠羊汉具有不平凡的人生经历,而这经历是平日对跤技的艰苦锻炼和一场场大赛的汗水和泪水累加起来的。挠羊汉一般具有较高的品格。他热爱家乡,热爱一切爱他的人们,珍惜自己的荣誉如同珍惜自己的生命,公平竞争,尊重裁判与对手,举止文明,决不使用不正当的手段来投机取巧,具有创造性的跤技,能给观众以极大的审美享受。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挠羊汉也是英雄。

对英雄人物的崇拜,实际是人们的一种偶像崇拜,是人们共同的心理需求。心理学将偶像崇拜定义为个人认同与模仿某人之言行及其自身价值的过程,是人们将自己的愿望、欲求、理想、情感和信念向外投射和放大,是一种深层自我的理想化。余秋雨认为:“年轻的一代刚刚开始离开父母的怀抱,他们迫切需要在社会生活中寻觅所能信任崇拜的对象。这个对象必然高于他们,但又必须在他们所能企及的范畴内,同时不帶有任何涉及到切身利益的功利色彩。”^②忻、定、原的人们自然也和其他地区一样,表现出对历史上为民族、为国家作出特殊贡献的英雄人物,如杨家将,岳飞的敬仰。然而,他们所能企及的是那些生活在他们中间,并有过人本领的人。这些人并非族老长辈、里长保长、村长村副,或士子、绅士、巨商豪富。因为人们对前者在言行上是表示服从,对后者则是表现为佩服。服从是不得已而为之,是责任。佩服是佩服别人所有而自己所无,同自己的精神生活并不发生关联。崇拜却不是崇拜别人所有自己所无的,乃是崇拜别人和自己所共有的,但别人却又远远超越自己的。在忻、定、原,可以说几乎人人都喜爱摔跤,都会摔跤,摔跤是人们精神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成为一个跤技超人的跤手是人们追求的理想和信念。挠羊汉是乡村社会普通阶层中间的成功者,广大摔跤爱好者是挠羊汉产生的社会基础,他们在精神上互相鼓励,不怕出身卑微,只要付出努力,就有可能获得成功。这样,广大乡民就很容易“把个人的缺陷投进比较幸运的人们的光荣成就里,借以取得补偿,这种倾向也许是社会生活中一种常见的现象。”^③可见,心理补偿是人们崇拜挠羊汉的心理根源。

^① 朱光潜:《朱光潜全集》④,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97页。

^② 余秋雨:《当代都市文化略论》,文化艺术,1997第1期。

^③ [美]悉尼·胡克:《历史中的英雄》,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6页。

一般情况下,崇拜中的情感大于理智,有时甚至压倒理智,使崇拜完全丧失理性,出现盲目崇拜。但跤乡人们对挠羊汉崇拜是十分理智的,他们所崇拜的挠羊汉除了要具有超人的跤技能给人们带来视觉上的享受和精神上的调节外,对其品格也有更高的要求,无怪乎跤乡人把摔跤的起源与杨家将和岳家军联系在一起。他们憎恶那些不遵守比赛规则、不尊重裁判和对手、举止粗野、持技自傲,甚至通过不择手段(忻、定、原的人们叫“诡串”,即“串羊”)获取“挠羊汉”桂冠者。对这些“不受欢迎”之人,跤场主持者一般都会在不引起矛盾冲突的情况下巧妙地把他们排除在赛事之外。一次原平阎庄庙会上举行挠羊赛,几位来自忻县曾经有名的跤手,为早点赶回忻县,企图在比赛中途上场,过早地结束赛事。他们这一做法实际是持技自傲,违反挠羊赛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比赛规矩。跤场主持者即命十来岁的小孩上场应战,让他们哭笑不得,只好退出跤场。^①

跤乡人对挠羊汉的崇拜,除了在赛场上对自己喜欢的跤手表现出如醉如痴的激情外,更为现实的是演绎出无数“跤场择婿”的佳话。那些出众的跤手和挠羊汉是家长为姑娘选择的佳婿和姑娘心中的偶像。家长会设法打听跤手的来历,倾心于跤手的姑娘们往往会“以心相许”,甚至大胆地表现自己的爱慕之情。虽无资料可以查考历史上究竟有多少“跤场择婿”的成功事例,但发生在现代的、并为人们广为流传的事例颇多。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为忻县粮食局赶大车拉运粮食的下社村一带有名的挠羊汉赵润书与在粮食局当装卸工年仅19岁的张海云交手。当时众人起哄,如果老赵输了,就把闺女嫁给张海运。结果赵润书连输两跤,而且还被摔了个血流满面。虽未正式承诺什么,但老赵一下看准了这个把自己摔倒的小伙子,事后就托人到张家提亲,把女儿嫁给了张海运。定襄县有一跤手叫康三,由于跤技不错,人长的魁梧,在跤场上总是吸引着那些多情姑娘的目光。有一年在宏道镇五月十三古会跤场上,康三与第四个对手交手时裤腿被撕破到腰部,大腿都露了出来,十分着急,不知如何是好。站在高凳上观战的一位姓刘的姑娘,立即跳下,掏出随身携带的针线,蹲下缝了起来。因有跤场缝裤这场戏,之后两人就经常形影不离地出现在跤场上,很快喜结连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忻州流传着“一工二干三军人,至死也不嫁受苦人”的姑娘择偶标准。然而,忻州一个村子中一个少妇,其丈夫是人们羡慕的军人,她观看了几场挠羊赛后,看上了一位跤手。“军婚”在当时是一个人们轻易不敢触及的“禁区”。但几经周折她还是离开了那位军人。^②这几则“跌跤输了嫁女儿”、“跤场缝裤,喜结连理”、“军人的

^① 田昌安:《忻定原跤乡文化探本》,稿本。

^② 崔富海(1935—),男,忻州市忻府区南高村人,现居住在忻州城中。2006年1月22日采访记录。

妻子看上挠羊汉”的真实故事说明挠羊汉在当地民众心目中具有很高的地位。民众对挠羊汉的崇拜强化了人们的尚武观念，使当地价值观念呈现出文武并重的独特局面。

结语

盛行于山西北中部素称“摔跤之乡”的忻州、定襄、原平等县市的摔跤挠羊赛是长期战乱的历史环境、农牧结合和民族融合等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经济的发展是其得以传承的物质基础，明清兴盛的庙会是其传承的载体。

随着乡村权力体系的变迁，传统摔跤挠羊赛的组织形式发生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它完全由村民自发地进行，由乡村精英组织，村社是它的最高组织单位。建国后随着国家权力的下移和基层政权的介入，传统挠羊赛的举行由原来群众自发、社区组织的模式转成了基层政权的一项职能，早先的农村合作社和后来的人民公社及其下属机构大队成为挠羊赛的直接组织者和费用的提供者。

村落凝聚力的强弱及村落在周边地区的地位是摔跤挠羊赛能否由一村成功主办的关键，同时摔跤挠羊赛的成功主办也积极地反作用于村落的凝聚与地位。传统乡村社会的教化体系制约着赛场跤手和观众的行为，使挠羊赛能够有序进行。而挠羊赛本身也是一种面向大众的、广泛而生动的教化活动。它在创造着一种文化，传承着一种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一方土地上人们的气质与心理，制约着人们的行为。

民众的广泛参与是摔跤挠羊赛的生命源泉，而摔跤挠羊赛的普遍开展，丰富了民间文化娱乐，使人们平时受压抑的心理得到全方位的调节。同时，在民间产生了成套的有关摔跤的词汇、谚语、歇后语、跤手绰号、渲染比赛气氛达到娱乐目的的逗引语等。这些语汇，可以说是口耳相传，妇孺皆知，担负着承载这一特有的民俗现象的使命。同时这些语汇进入乡土话语系统，使该系统有了跤乡独有的特色。

在忻、定、原地区会不会摔跤、敢不敢摔跤、敢不敢上跤场被视为衡量一个男子汉有无勇气和胆量的无形标准，且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并使挠羊汉享有特殊的地位。这种由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使文武并重成为忻、定、原社会的价值观念，使跤乡民众的社会生活有了一种别样的风情。

参考文献

一、理论著作和一般论著

- 1、乔志强：《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 2、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 1985 年版。
- 3、乌丙安：《中国民俗学》，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 4、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 年版。
- 5、明恩溥：《中国乡村生活》，时事出版社 1998 年版。
- 8、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年版。
- 9、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年版。
- 10、严昌洪：《中国近代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 11、张光博：《社会学词典》，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 12、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
- 13、费孝通：《生育制度》，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
- 1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
- 15、赵世瑜：《狂欢与日常》，北京三联书店 2002 年版。
- 16、巴赫金：《拉伯雷研究》，李兆林、夏忠宪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 17、安介生：《山西移民史》，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 18、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北京三联书店 1987 版。
- 19、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 年版。
- 20、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 21、朱光潜：《朱光潜全集》④，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
- 22、（美）悉尼·胡克：《历史中的英雄》，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
- 23、秦永洲：《中国社会风俗史》，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 24、庄华峰：《中国社会生活史》，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 25、张明远：《忻州史话》，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 25、周如璧：《忻州魂》，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5 年版。
- 26、忻州考古队编著《忻州游邀考古》，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二、报刊资料和一般资料

- 1、雷鸣：《忻州摔跤文史资料汇编》，忻州摔跤俱乐部。
- 2、《忻州文史资料》，第1辑。
- 3、《忻州文史资料》，第3辑。
- 4、《忻州文史资料》，第8辑
- 5、《忻州文史资料》，第11辑
- 6、《忻县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
- 7、田昌安：《忻定原跤乡文化探本》，稿本。
- 8、刘瑞芝：《忻府区高城乡永丰庄跤场访录》，稿本。
- 9、张金锁：《原平跤坛风云人物》，山西省美术印刷厂印，内部书号2000字第98号。

三、论文

- 1、陈文华：《论民俗文化圈》，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 2、马成俊：《论民俗文化圈及其本位偏见》，青海民族研究（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8期。
- 3、张松柏：《辽代的摔跤运动》 内蒙古文物考古 1997年第1期。
- 4、李国安：《我国古代摔跤运动发展史略》，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04年第5期。
- 5、行龙 张万寿：《近代山西集市数量、分布及其变迁》，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4年第2期
- 6、秦永红：《〈庙会文化经济特色及其历史、现状与未来的展望〉》，宗教学研究，1995年第4期。
- 7、赵英霞：《乡土信仰与异域文化之纠葛——从迎神赛社看近代山西民教冲突》，清史研究，2002年第2期。
- 8、渠桂萍 王先明：《乡村民众视野中的社会分层——以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初的华北乡村为例》，人文杂志，2004年第6期。
- 9、王先明、尤永斌：《略论晚清乡村社会教化体系的历史变迁》，史学月刊，1999年第3期。
- 10、杨建华：《日常生活：中国村落研究的一个新视角》、《浙江学刊》、2002年

第4期。

- 11、王庆成：《晚清华北村落》、《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
- 12、王雅林：《走向学术前沿的生活方式研究》、《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6期。
- 13、蔡灿津：《生活的意蕴与生活方式的嬗变》、《实事求是》1999年第4期。
- 14、冯敏：《生活方式的共性和个性》、《北方论丛》1996年第6期。
- 15、李善峰：《20世纪的中国的村落研究——一个以著作作为线索的讨论》、《民俗研究》2004年第3期。
- 16、费孝通：《试谈扩大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致 谢

在经历了诸多失败和挫折，尚未能踏入学术之门时，有幸重回母校，拜王守恩先生门下攻读硕士学位。王先生认真而严谨的学风，使我受益匪浅。在本论文的撰写过程中，先生从选题直至成稿一直给予我精心的指导和帮助，提出了很多关键性的建议，为我解开了无数的困惑。在此我谨向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深深的敬意。

在这几年的学习中，我还有幸聆听了行龙、李书吉、岳谦厚、郭卫民等先生的教诲。他们那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崇高风范，朴实无华、平易近人的人格魅力，岂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得清，道得明的。在此对他们一并表示感谢。

拙作完成过程中，永忘不了我的小学老师刘瑞芝先生，他不辞辛苦、走街串户帮我搜集和整理了大量的资料，而不求任何回报。

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我单位领导王志连院长对我读研的鼎力相助和我的老同学崔宏伟先生对我生活上的关心和精神上的鼓励，这是我顺利完成学业的重要前提。

在学习期间，赵新平、邸志平、张爱仙、潘印、张晓红等同学都对我有诸多的帮助，使我心中平添了一份美好的感情，共同拥有了一段难忘的经历。

承 诺 书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学位论文的知识产权属于山西大学。如果今后以其他单位名义发表与在读期间学位论文相关的内容，将承担法律责任。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文献资料外，本学位论文不包括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成果。

学位论文作者（签章）：潘慧生

2006年5月22日